

7-99

讀者參考

誰是偉人

画家陈逸飞印象记

大戶操盘警示录

第三只眼睛看文坛·作家肖像

东欧昭示我们什麼?

IS REFERENCE DIGEST

1997年6月出版

15

目 录

4	把中国建设成文化大国 ——答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 问	——记叶利钦的小女儿塔季 扬娜
7	东欧昭示我们什么? ——重读《苏联经济论战中的 政治潜流》	59 朱镕基谈国企改革
13	文明冲撞引发世界大战? ——亨廷顿《文明冲撞》引发 国际论争	60 不通过改革,反腐败等于 割韭菜
17	注意桥本	60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18	'97 公费生走进历史 ——自费自主上大学	61 我国将调整十大经济比例 关系
22	“数字升官”现象揭秘	61 中国面临的十大问题
25	大户操盘警示录	61 我国投资效益呈下降趋势
30	去怀柔钓鱼	62 建立出资人制度是重大创 新
32	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 境界	16 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
37	倪润峰与“长虹”彩电	62 要使住宅建设形成新的消 费热点
40	一个清醒的成功者 ——画家陈逸飞印象记	24 我国农作物适宜区向北延 伸
47	张宁经历“选妃”之后	63 我国农业生态条件恶化
50	风流一世的“红色大亨”	63 防止出口商品“大旅游”
53	母爱的力量	64 铁路改革将有大动作
56	戴高乐与智障女儿	12 北京首次以立法形式确 定:市政府出台重大决 策须报市人大常委会
57	巩俐与黄和祥	71 厦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 三千美元
58	叶利钦的“形象设计师”	65 经济学教授谈买房

-
- | | |
|-----------------|---------------|
| 65 中国富翁榜,境外据何评? | 103 学学罗素 |
| 66 租房市场蓄势待发 | 104 新一代书生 |
| 67 如何参加拍卖会? | 105 关于年龄的中西比较 |
| 68 如何投资邮票市场? | 106 正面人物 |
| 69 看影视人如何聚财 | 107 诺贝尔与孔夫子 |
-
- | | |
|-----------------|---------------------------|
| 72 '96 中国版权贸易回眸 | 108 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生
产三者的关系 |
| 74 呼唤国产爱情片 | 110 世纪之战:人类基因组计
划 |
| 36 中国杂志进入转型期 | 112 “复制”人类? |
| 6 中国进口外版图书下降 | 113 奥运花钱大竞赛 |
| 78 1996:有影响的十部书 | 114 我国足球俱乐部“黑洞”
难填 |
| 79 企业管理名著50种 | 114 中国拳击绝不搞职业化 |
| 80 学林散叶(一) | 115 谁是伟人? |
| 90 学林散叶(二) | 117 普通人怎样脱颖而出? |
-
- | | |
|---------------------|---------------------------------------|
| 81 中国:来自古地中海的大
陆 | 120 兴趣、业余时间与成功 |
| 82 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渤
海? | 121 “黑马”是怎样跑出的?
——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区首
长记 |
| 83 人工种出大森林 | 127 香港是个移民大社会 |
-
- | | |
|-----------------------|----------------------|
| 84 第三只眼睛看文坛
——作家肖像 | 129 美商成为香港最大外商
集团 |
| 91 韩少功印象 | 130 总统竞选:美国人的游戏 |
| 31 “小女人散文” | 136 英国绅士今安在? |
-
- | | |
|-------------------------|----------------|
| 93 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
的幕后 | 140 吃在法兰西 |
| 97 蒋孝勇的最后声音 | 142 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的 |
| 101 本色 | |
-

较量		39	二十一世纪换新历
144	啊,犹太人!	152	国际上有关海洋国土的 几个概念
134	英萨利披露红色高棉分 裂内情	156	亚洲、欧洲、美洲部分国 家的“别号”
133	荷兰的鲜花、木鞋、风车	153	智力的新概念:人的8种 智力
143	哈佛是一面镜子	154	买了商品房,七十年后怎 么办?
21	世界旅客最多的国家和 地区	154	药品批文号与批号
		155	交互电视
146	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在于 平衡	155	摆放家用电器有讲究
147	延年益寿十条准则	155	AV功放的选择
148	中年知识分子的晚间保 养	157	出游应做知识准备
149	人生道路上的危险路段	157	淡水垂钓怎样选点?
149	预防心脏病,节食比运动 更有效	158	资料室: 犹太人定居点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克什米尔问题 核反应堆
150	超静超净也有损健康		
150	夏季活饮食	封面	画家陈逸飞(原载《世界时装 之苑》)
151	人将根据自己的基因进 食	封面	有轨电车集锦(原载《世界知 识画报》)
119	你知道“天高地厚”吗?		
152	“北京时间”揭秘		

把中国建设成文化大国

——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

□王 蒙

记：您提出把中国建设成文化大国的理论，我特别赞成。您为什么要提出建立一个文化大国呢？您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蒙：我首先声明，我是在今年政协会上提出这一见解的。它目前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的想法是：中国本身是一个大国。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地理上的大国和政治上的大国。从历史上看，它也是一个大国。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大国。

中国的目标不是一个军事大国。因为，第一，中国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第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军事实力，不可能超过美国，也不可能超过俄罗斯，而且中国也屡次宣布了它的军事力量完全是以防御为目的。

那么，能不能做经济大国呢？西方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很快上升至世界前三名，即美国、中国和日本。甚至有的认为中国再过几十年，生产总值会超过日本和美国。但我对这一点，不做过高的希望。因为中国的经济实际上还是非常落后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经济问题要看人口的

人均产量。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属于世界上比较低的国家。另一个是经济问题不但要看数量，而且要看质量。中国的产品中属高科技、高投入的所占的比例还相当小。这一点无法和美国相比，也无法和日本相比。

同时，中国人又有很强的自尊心，希望国家的地位和它的历史、人口数量相称。因此我觉得应该提出建立文化大国的目标。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从古代就保留下来的文化，是目前以西方为基地的主流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参照系。另外，提出这个目标也有助于中国为自己塑造一个美好的形象。因为中国早就宣布过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对中国来说，争夺世界霸权毫无意义，对世界也毫无好处。所以我觉得建立一个文化大国，用文化的特色来贡献给全人类，这是一个美好的选择。这样也把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愫吸引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来。

建设文化大国的具体内容，我想有这么几点：①对汉语和汉字的重视。汉语和汉字是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创造。中国对自己的语言和

文字要特别地重视。作为官方政策，中国政府曾经宣布过汉字改革的最后目的是实现拉丁文。根据实践经验，我个人很怀疑汉字能否走拉丁文的道路。我认为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民族，也没有中华民族的统一，也没有中华民族的文化。我知道许多日本友人，也不赞成中国走最后废除汉字的道路。中国政府应该花更大的力量，包括财力，来鼓励本国和外国人学习汉语和汉字，而且要学得好。② 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遗产的重视。一个是对文物（日本叫文化财）的保护。我们现在做得还很差。还有就是出版中国古代典籍。对文物和历史风貌的保护，以及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应该成为全民的共识。

再有，中国民族和民间的文化遗产，也是非常丰富的。文化部主持编纂的“十大集成”，就是把中国历史上以及民间的各种戏曲、故事、曲艺等资料维护起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建设文化大国决不是不学习外国好的东西，而是要更大胆更全面地学习国外一切有益的东西。学来以后也会变成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意大利歌剧。中国人表演和演唱意大利歌剧带有一种东方的色彩，他们声音响亮的程度可能比不上欧洲人，但他们表达感情比较细腻，用中国人的说法叫做嗓子比较甜。虽然是用意大利语表演意大利歌剧，

但中国人表演和意大利人表演不一样。它已经变成中国的意大利歌剧。又比如芭蕾舞。芭蕾完全是外来的艺术。中国的芭蕾舞最早是在俄国（当时是苏联）人的帮助下设立起来的。但是目前中国有了自己的剧目。中国人的身材与斯拉夫人不一样，表达感情的方式也不一样。中国芭蕾舞演员手的动作，要比欧洲人细腻得多。在表达感情方面，也具有东方人的特点。这方面我觉得日本的经验也是很有意义的。我曾经三次访问法国，法国的大菜是很有名的，但我最满意的法国菜是在日本的富士县吃的。那里的一家法国餐馆做得既有法国菜的味道，又有日本菜的精细。

我说的文化大国的意思，仍然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中国文化只有在开放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新的生机，焕发出自己的光彩。我希望建设文化大国的思路，能够成为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共同的目标。它有利于中国更团结更稳定，也有利于中国走上建设性的道路。

记：您提出文化大国的想法差不多半年了，有没有人响应？是否有人发表对此做出反应的文章？

蒙：在我所在的政协那个文化组里面，有几个作家和画家赞成我的思路。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

记：您谈这个思路时，举了法国的例子，是出于什么考虑？

蒙：因为法国提出了这个口号，做文化方面的超级大国。我很欣赏他们的这一提法。它既表达了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感，又不陷入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争斗。

记：您的观点能否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它实现的可能性大不大？

蒙：我认为有实现的可能。我正在整理我的思路。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举办的“展望二十一世纪”论坛上，我的发言也谈到这一点，也还是受到与会者欢迎的。

记：兴办文化教育需要花很多钱，中国的财力如何？

蒙：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因此中国政府把发展经济作为最迫切的任务，对此我也没有异议。中国还有6000~8000万人口在温饱线以下，他们还吃不饱饭。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方面提出过高的经费要求，也办不到。因为人必须吃饭。

记：最近我到青海省，看到那里的文物古迹被盗掘得很严重。

蒙：这是一个很大的破坏。中国自“文物法”颁布以来，惩治过许多盗掘文物的罪犯，直至处以死刑。但这个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记：建设文化大国，国民素质很重要。因而教育很重要。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有些地方还达不到，这样就产生了“希望工程”。在提高人员素质方面，中国如何考虑？另外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来看，很多政治运动都是从文化开始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化比较敏感，

文化部长往往成为运动冲击的第一个目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蒙：这就牵涉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和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意识形态问题会变得非常尖锐。当文化问题全部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了的时候，会导致文化问题得不到心平气和的讨论。但自1979年以来，中国已经把意识形态领域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抛弃了，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主。我提出建设文化大国的想法，除了“文化大国”四个字是重要的，“建设”两个字也是重要的。就是说不是靠斗争出一个文化大国来，而是靠全面的建设。首先是教育，我同意您的讲法，就是要发展教育。

（摘自《知识与生活》）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BOOKS TRADE

中国进口外版图书下降

据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统计表明，中国进口的外版图书大幅减少，只等于10年前的1/10至1/5，国外报刊只相当于10年前的1/3。

目前世界上发行的报刊约十几万种，现在国内每年的外刊总订量为2.5万种，比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学校的订量还少，而砍掉的绝大多数是科技期刊。

原因之一，人民币贬值；原因之二，国外书刊的自然涨价，平均每年递增10%。两项因素相加，使进口书刊的价格比十年前上涨了6倍。

（摘自《生活报》，张文海文）

东欧昭示我们什么？

——重读《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

□王跃生

《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是英国人莫舍·卢因在70年代中期写的书，其中译本80年代曾流行于中国经济理论界和改革研究者之中。90年代的今天，当我重读此书时，发觉10年前我们并未能读到这本书的全部，按照流行时期的“流行读法”，我们可能读丢了些什么，我们忽略了书名的提示，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经济论战”上面。

今天，东欧和原苏联各国“全盘西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已初步形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何使社会政治体制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问题已经有了公认的结论，更不等于各国已经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对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中国来说，这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面更尖锐、更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旧书新读，我特别注意第三部分关于改革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某些看法。

一曰“平民社会”的到来。苏联十月革命后形成的社会体系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官僚等级社会体系，一切社会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

权力、行政权力以及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言论的表达等等）都集中在国家政权机构手中。随着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的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到六七十年代，苏联社会已呈现出一种不同的状态，这种状态被本书作者称作“平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到来（第十章）。这种平民社会的具体特征作者没有描述，按照一般理解，平民社会就是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社会成员具有自觉的公民权力意识、要求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社会。平民社会形成的原因，在作者看来，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化过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迅速成长起来的非体力劳动的白领阶层”，使“俄国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便从一个基本上是庄稼汉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工农业结构的国家”。（231—232页）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社会基础的形成，既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结果，更是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有意识地构造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原因。

二是社会利益和社会集团差别的公开化、合法化。经济发展和改革、平民社会的来临使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差别更加公开、明确，所谓全民利益日益让位给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作者认为，“由于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它的这些新的阶级和对国家起着重大战略作用的大量社会集团，于是也就产生了要求各种优惠待遇、特权地位和势力，以及参与领导的种种压力”。各个利益集团“尽量设法坚持和捍卫自己的观点和利益，继续不断地向党提出各种无异于权力法案的要求，包括承认其利益并有权保护这些利益，有自主活动的自由”。“新的社会现实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的社会差别”。（232—233页）这种社会利益的差别，在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之后，肯定会变得更大、更强烈。对这种我们如今已经耳熟能详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差别，视而不见和怒发冲冠都没有用，以为可以轻易抹平这种差别也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出路在于承认其合法化，建立一种与此相适应的多元社会格局，让不同社会集团都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分享权力，表达政见。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苏联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早期的多元主义”，以适应上述变化。不过，后来苏联和东欧的崩溃表明这种早期多元主义不足以挽救那种业已腐朽的制度。

三是妨碍改革进程的主要障碍

是旧的政治结构。作者根据六七十年代苏联东欧的情况认为，党的权力过度集中使之不可避免地腐败，但是，权力并非集中在普通党员手中，而是集中在各级（特别是高级）官僚机构手中。这样，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矛盾会反映到党的系统内部，形成普通党员和下级工作人员同官僚阶层的矛盾。作者写到，“由于否认社会各阶级和各集团有发表政见和公开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力，党实际上助长了现存阶级分歧和矛盾的激化。这些矛盾在经济衰退和社会机动性减弱的情况下，便具有更大的爆炸性危险；它们渗透到党内，使本来已在削弱着党的领导能力的各种因素更加复杂化。党既然追求更全面的控制，那么任何有损其控制的事物对现行的权力结构都会是一种威胁。因此必要的改革和政治上的创新便被看作主要的危险”。“经济上已经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正在阻碍着经济改革和妨碍着改革派的各种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由于总的政治环境造成的，而国家和党的无所作为与落后状态都应该归咎于这种环境。”（304—305页）作者70年代中期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关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关系的较早的看法和议论了。

四是专家治国的改革无济于事，不能代替根本的社会政治改革。作者认为，既然传统的官僚体制对于真正的社会政治变革态度保守，而日益增加的经济压力和国际压力

又使利用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必然选择，那么官僚体制总是希望进行单纯经济的、“专家和官僚治国型的改革，而不愿采取社会政治型的改革”。“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改革的某些可行方案来说，不过是个用语问题，但对于政治改革来说，却是个纲领性问题了。”（313、306页）但是，连贯的理论逻辑表明，要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由于利益集团、权力分配、社会矛盾等等，最终必然导致政治改革和多元化。东欧的经验更证明，仅靠引进技术、专家治国、提高效率、简政放权甚至利用市场都无法从根本上挽救旧式的经济和社会，否则，昔日东欧就不会变为今日东欧，苏联也还会是苏联。在这个意义上，作者20年前的话仍有意义，“……容许各个社会集团和各种集体利益有表达意见和参与更自由的实力较量的权力，这样才能使政治制度更加合理，使社会生活更好地协调起来并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就必须解放全体公民，并为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创造条件；最后，还必须克制党对权力的欲望，使党变成一个无论在多党制或一党制中都有内部政治较量的自由的政治组织。”（315页）

今天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现实早已超越了莫舍·卢因当年的论断，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应验了作者的观点。俄罗斯和东欧以极大的代价（甚至是“国破家亡”的代价）完成了社会结构的转变，无论这种转

变对它们幸或不幸，对于我们总有一种启发和借鉴的价值。撇开意识形态方面，从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及为市场经济提供相宜的社会政治环境角度来说，从社会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代价角度来说，我们与东欧面临的问题有许多共同性。在这方面，东欧的代价大得多，但从解决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深层矛盾角度来说，东欧已经超越了我们。

市场经济改革是彻底的与逻辑一贯的改革。虽然当代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完全不排除国有企业、政府干预、社会福利等等，并以这些制度的存在为条件。但是，混合经济毕竟不等于新生的市场体制同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的“大杂烩”，无论怎样强调对这些老式国有企业的简政放权、独立核算也是一样。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对现存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但是，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又是一个相当棘手的任务，弄得不好，城市工人大范围失业和贫困很容易造成社会的矛盾和动荡，甚至危及政局稳定。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又不完全是经济问题，如果仅仅在经济领域内兜圈子，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死结”。东欧曾一再在此类问题上碰壁，波兰甚至连一次像样的调价都难完成。而在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变革中，这样的矛盾完全被超越了。通过国有财产平均分配、证券私有化、货币私有化等手段，

目前东欧各国大都已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造任务，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也正在被逐渐消化和吸收。就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而言，在某些方面东欧还不及我们，但其进一步发展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除了技术性的选择），而我们则还在围着国有企业的难题绕圈子，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东欧的另一个进展就是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架构。我们当然不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讨论东欧的多党政体、选举制度，更不是说可以照搬到中国。我们是在有利于经济改革的政治环境的意义上看待这种架构。这种新的架构的出现一方面使设计经济改革的思路大为开阔，可供选择的手段大大丰富；更重要的是，新的政治架构为消化和吸纳经济改革政策的消极后果提供了较多的回旋余地，创造了宽松的环境。譬如由于社会矛盾带来的罢工、示威、游行等等，在东欧的旧体制下，这些现象的出现或者导致政府更迭、改弦易辙，或者导致高压政策、严格管制。而在新架构下，它不过是某些社会团体表明其政见的一种方式而已，只要多数选民支持政府的政策，政策就可以延续。东欧的激进改革能够在几年前社会的一片混乱中坚持下来，部分地就得益于这种机制，东欧某些国家的共产党能够重新上台执政并对政策作出某些调整，部分地也得益于这种机制。

多元利益集团和多元化社会的逐渐形成与此具有类似的性质。在经济市场化和权力与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包括在市场经济形成后，社会各集团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利益会日益有所不同，新旧官吏同普通百姓、贫富分化造成的富人和穷人、具有自由倾向的分子和工人农民，他们的利益差别是显见的，也是正常的。承认这种差别就应该容许各个集团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东欧变革初期政党纷起、派别林立的局面具有矫枉过正的性质，但鱼龙混杂后剩下的一些团体往往代表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市场经济社会，从根本上说，由于社会成员在占用和支配社会财产上的差别，必定是一个多元社会。在这一点，东欧走在我们前面。

最后一点，一个动态的开放社会的逐渐形成。一个持久稳定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社会。东欧（和俄罗斯）在过去几年间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稳定，其政府更迭、党派争端、民怨爆发、利益冲突使社会似乎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但是，撇开过渡性因素，现在我们会发现，实际上社会不是变得动荡了，而是变得稳定了：经济生活已相对独立于政治运作，政权更迭不再意味着社会混乱，党派争端更多了，但它已成为职业政客的一种职业活动，不再对社会具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民怨累积通过选民投票、游行请愿、言论发泄直至移民出走而得以释放。

和平衡,利益冲突则依靠党派制约、新闻监督、司法独立而得到调整 and 牵制,不致失控。在社会转型如此剧烈、原有体制那般集权、市场化和私有化提供了如此“良机”的情况下,东欧的政府和官员远比经济更为发达和更为稳定的东亚模式下廉洁得多,这一点颇发人深省。

中国与东欧和俄罗斯都不相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水平、自然条件都与东欧乃至俄罗斯存在差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在目标模式上也与东欧的“全盘西化”不同。因此,如果认为可以照搬东欧的做法就大错特错了。但是,苏东的实践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的现实。

中国有八亿农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这是中国制定任何政策都不能忽略的一个现实,是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这种现实也是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国近20年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的巨大进步,城市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快。其结果是,农民,特别是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在人口中的比重直线下降,而城市人口(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广义知识分子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这种情况也许目前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的总体面貌,但这种加速发展的趋势无论如何将日益成为影响社会价值选择

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变数。如果不考虑这些发展中的因素,不考虑一个可能的“市民社会”将要来临,仅看到农民、文盲、贫困的一面,政策的制定就可能失之偏颇。说到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和改革,这种发展的结果却又要求更深的改革和全面的市场经济。诚如斯言,市场经济制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复制和发展着市场制度自身。

如果说“市民社会”的到来尚需假以时日,那么社会利益差别与利益集团的日益公开和强化则是中国改革带来的社会现实和影响未来社会选择的因素之一。在目前的中国,这些社会集团(社会阶层)至少包括,普通劳动者工农阶层、在市场经济中日益富裕起来的新兴企业家和其它富裕阶层、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日益壮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劳动者阶层以及主要由中层以上官员构成的集团。除此之外,还有不同地区利益所形成的利益差别。这些集团在社会价值取向上不同,在改革中受益不同,对未未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也有所差别,总之,存在着不同利益。在中国现时的社会格局中,各个利益集团无法通过公开透明面畅通的渠道表达利益,于是出现了在市场化中瓜分国有财产、以权谋私、腐败泛滥、消极怠工、职业道德水平下降和以民谣等形式表达不满等等社会现象。这种利益差别和矛盾既不能消除,唯有通过政

治社会的改革，建立相应的体制适应这种新的社会格局。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市场化，这为我们带来了一些优势。但是，以往十几年依靠这种策略而得益可能意味着现在将要付出代价：没有能够承受国企破产、工人失业的社会承受力，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无法真正开始，从80年代来就开始在此徘徊，直到今天仍未找到出路；没有一种新的政治结构，产权多元化和市场化就意味着全民的财产被官僚个人化、私有化，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没有来自其自身之外的独立集团的监督和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必然导致以权谋私和腐败的泛滥，这种折扣在旧的

结构中是无法解决的；没有一种制度化的、较平和的矛盾释放机制，矛盾的累积最终会导致矛盾以异常的形式爆发和社会动荡，结果就是改革的倒退；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追求，“泛市场化”将把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引向极端，把人性中的阴暗面推向极至，并把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则社会化。近两年改革步伐相对放慢，矛盾相对尖锐，说明我们已开始付出这种代价。

一部西方学者的旧著，难免片面和偏激，东欧自身也矛盾重重，但是这部著作的一些思想恰好能被东欧和俄罗斯的经历所证明，这些思想和经历又能对今天的中国提供一些启示，这也就够了。旧书新读，还能要求什么呢？（摘自《读书》）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以立法形式，要求北京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要向其进行报告。

这项名为《关于市人民政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重大事项的若干规定》的法规，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法规明确规定了市政府向市人大报告重大事项的范围是，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局部调整及总体布局的重大变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北京首次以立法形式确定： 市政府出台重大决策 须报告市人大常委会

展年度计划的部分变更、预算的调整；有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改革方案；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外的重大建设项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和重大部署；同外国缔结友好城市，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其他重大问题等一系列涉及本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若干方面的内容。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陈选权解释说，这项法规的立法依据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摘自《羊城晚报》）

文明冲撞引发世界大战？

——亨廷顿《文明冲撞》引发国际论争

□ 董 政 编译

美国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最近在美国和德国同时抛出新作，对其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撞”、“文化战争”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延伸。这本厚达584页的《文明冲撞》一书，引起了战后50年来最为激烈的论战。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称之为“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德国《明镜》周刊于1996年岁尾在波士顿采访了亨廷顿教授，所问所答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亨廷顿先生究竟想推论出什么逻辑？“山姆大叔”重提“中国黄祸”的醉翁之意何在？奇文共欣赏。

亨廷顿预言：中越冲突引越中越战争，日本倒向中国，阿尔及利亚向法国发射核弹

《明镜》记者问：亨廷顿教授，您在新作中描写的世界大危机是这样引起的：一个在经济和军事上日益自信的中国，为了争夺巨大的海上油田，在与邻国越南的争执中展开进攻。河内向华盛顿求援，游弋在该地区的一支美国航母编队遂奉命出发，准备实施报复性打击……

亨廷顿教授答：……但是日本不允许美国使用其远东的军事基地，宣布了中立立场。北京的潜艇重创了美军舰艇。在我的脚本中，起初的冲突是有限度的，因为中美两国都很清楚，双方的核导弹均可以打到对方国土。

问：美国人会问，为什么他们要为远东地区的一场争论而蒙受巨大危险？

答：美国本土的公开媒介会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西方的弱点逐次显现，首先是对其他文化圈内的较大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印度利用各大国卷入冲突的机会向天敌巴基斯坦发动进攻。穆斯林社会中的反西方浪潮高涨，一些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政府被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势力推翻。

问：冲突开始升级？

答：首先是对以色列展开猛烈的攻击。美国试图将俄罗斯拉进北约并唤醒其欧洲盟国，但这些努力均告失败。欧洲盟国虽然在外交和经济上给予援助，但在军事上犹豫迟疑，不愿卷入。之后，日本放弃中立立场，倒向中国一边。

问：世界大战由此而爆发？

答：中国及其穆斯林主要盟友伊朗将核导弹秘密运往波黑和阿尔及利亚，企图威慑欧洲人。塞尔维亚人扮演起基督教卫士的角色，单独向萨拉热窝进军，并在那里缴获了一部分核弹。作为报复性打击，阿尔及利亚向欧洲发射了第一枚核弹，目标是法国港口城市马赛上空。

问：这样一场宗教文化大战将会导致什么结局？双方的核洗劫，双方因国力衰竭而被迫停战……

答：……无论如何，世界政治中心将向南转移，转向正在蓬勃发展，并处于战争冲突圈外的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对欧洲和美国而言，后果是毁灭性的。

问：您描写的这幅可怕场景似乎过于牵强。

答：我并不是说一定会有这么一天。一场这样规模的全球性冲突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绝不是不存在。在这一脚本中，最令人感到可信的，因而也是最能撩拨情迷性的，当数战争的起缘之说：一个西方文明的核国家，向一个中国文明的核国家发起战争，从而导致了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一场大战——而穆斯林世界也积极参与战争。

问：您是在宣传一个好斗的中国引起的“黄祸”，而且它得到了敌视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共同体的结盟。难道说冷战结束之后，我们西方还需要树立新的假想敌？这幅假想敌的画面，为什么偏偏是由您这

样的哈佛大学教授来描绘的？

答：如果有人认为我是想回到冷战甚至制造一个新的“热战”，那么纯属诽谤。但是，我坚信未来的世界政治并不首先取决于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或经济集团，而是取决于敌对文化的冲撞。如果未来爆发世界大战，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未来的战场将位于不同文化接壤的前沿线上。

亨廷顿预言：世界上将有八种文明，文明冲突引发文化战争，最危险的是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带

问：您对文明一词如何定义？

答：文明是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一个较大的文化单位。在这一单位内，应拥有共同的语言、历史和习俗。社会的迅速变迁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代化，驱使人们去寻找新的共同点；这一趋势弱化了作为认同根源的民族国家属性，从而使宗教信仰常常取代民族国家的地位：一个人可以有一半法国血统、一半阿拉伯血统，但是不可能具有一半天主教、一半伊斯兰教的信仰。宗教创造了共同属性，并与其他教类相互界定分野。

问：您认为世界上有多少种文明？

答：未来世界将主要有七至八种大的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或许还有非洲文明。这些文明之间的前沿，取代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分

水岭,成为危机和流血冲突的焦点。

问: 您的“文化战争”理论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答: 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发生的较大规模战争几乎全都是例证。想一想巴尔干冲突,实际上是东正教徒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波斯尼亚人的战争;想一想车臣战争,是俄族人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战争;想一想伊斯兰国家和孔夫子国家千方百计拥有核武器的企图,还有美国同日本之间具有文化特色的贸易摩擦——美国与欧洲之间是不可能出现此类贸易冲突的。

问: 依您之见,文化战争的最大危险位于何方?

答: 伊斯兰世界的边缘。从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到近东,并穿过北非;但是东南亚地区也存在着穆斯林狂热国家与其邻国间的争端。

问: 欧洲是否存在危险的文化前沿线?

答: 冷战结束后,铁幕已被文化壕沟所取代。基督教的西欧与东正教的东欧之间,壕沟正在进一步加深。今天的宗教分水岭,与1500年时几无二致:从巴尔干到俄罗斯。匈牙利的天主教西部与东正教东部一分为二,罗马尼亚亦被宗教壕沟拦腰切斯,巴尔干的前南斯拉夫则在血腥中四分五裂。

问: 您当真认为欧洲这一壕沟带随处都有战争危险?

答: 不会出现较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南斯拉夫已经打过了,塞

尔维亚人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潜伏着武力冲突,希腊人同土耳其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脆弱。分歧不一定意味着必然升级为战争,但紧张的态度却可能恶化。

问: 如果您把巴尔干战争简单地归结为文化之争、宗教之战,似乎难以立论。一方面,穆斯林的支援微不足道;另一方面,若无美国的默许,伊朗、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不可能向波黑地区提供军火。

答: 为了支援波斯尼亚人,穆斯林国家投入了数亿美元。这才是巴尔干地区力量失衡的主要原因。

李廷镇新言: 儒教大国与伊斯兰大国的结盟对西方构成了最大挑战,因此美国应当停止裁军步伐

问: 如果您把西方面临的威胁说成是孔夫子国家和穆斯林世界联手结成的轴心力量,此说似乎更加站不住脚。您为什么认为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会联手反对西方?

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和军事世界大国。北京向伊朗和巴基斯坦出售了核工艺。重要的儒教大国与伊斯兰大国建立军事联盟的事实不容否认,从面对西方构成了最大的挑战。

问: 武器工艺向来卖给开价最高的买主。美国人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了最先进的战争器材,却没有人担心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有什么联手同盟,如果说北京现在有忧虑的话,恰恰应该担心伊斯兰势力,因为中国西北部和新疆生活着许多

穆斯林。

答：说得很对，中国同穆斯林的联盟也许是暂时性的战术。但是，他们毕竟存在着核扩散的危险。

问：您认为世界文化正在分崩离析，但有人却认为世界文化正在趋向全球同一化。MTV、Macintosh、McDonald's——快节奏的音乐、快速运算的计算机、快餐，这难道不是西方输往全世界的？这难道没有成为一种世界文化？穆斯林和孔夫子的后代难道不向往Mickey Mouse(米老鼠)和Walkman(随身听)？

答：所有文化都想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想西方化。如果俄罗斯人喝可口可乐，他们并不会因此而自动地“美国化”；同样，如果我们吃生鱼片、寿司，也不是想“日本化”。

问：但是您无法否认，好莱坞的电影和迪斯尼的电视节目也会影响印度或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我们应当把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人吗？

答：不，那样做对我们不利。如果想保持西方文明的活力和实力，就必须放弃使西方文化普遍化的企图，美国和欧洲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共性，西方人必须紧密携手，否则他们会被分而治之。

问：西方的人权观不应该推向全世界？我们的政治家们不应该向伊朗或中国施加压力？

答：我们应该支持人权，但不

应该要求其他文化遵从我们的西方模式。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年初(指去年)说过，欧洲的价值观是欧洲的，亚洲的价值观则是全球的。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一定会反对取消酷刑。就连大多数美国人也支持体罚之刑。

人们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人们认同于自己的文化——二者紧密相关，而且日益紧密。因此，我的理论模式是冷战结束后未来世界的最佳指南针。

问：根据您的观点，与西方文化对立的是其他所有文化。您还认为，由文化冲突导致的战争，要比其他所有战争更加血腥、更加野蛮。您曾呼吁美国和欧洲停止裁军。如果战争煽动者们给您献上一片掌声，您大概不会感到惊讶吧！

答：我以前赞成过裁军进程，但现在却改变了主意，认为美国应当停止削减武器装备。应当为世界政治的新纪元寻找一个新的模式，应当绘制一幅理智的世界新地图。

(摘自《青年参考》)

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

据《中国改革报》2月13日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春节前夕在山东视察农村工作时强调，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必须长期稳定不变。中央已经决定，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